

原住民抗爭運動與地方網絡： 以菲律賓科地雷拉日為例

執行期間：104 年 2 月 25 日至 104 年 5 月 22 日

賴奕諭
Yi-Yu Lai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
MA Student,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June 20, 2015

103年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原住民抗爭運動與地方網絡：以菲律賓科地雷拉日為例

計畫類別：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田野補助案
選送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短期出國研修補助案
世界南島研究國外學者訪台交流補助案
世界南島研究碩、博士生論文可行性之文獻、資料蒐集補助案
(含政府檔案、教會檔案、圖書館、博物館、田野調查等等)

執行期間： 104 年 2 月 25 日至 104 年 5 月 22 日

計畫單位/人員 (簽章)：
車良實言訓

成果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附註：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或研究計畫成果全文資料，授予世界南島學術研究計畫辦公室，得限計畫辦公室於教育部申請年度計畫或呈報成果時使用，以微縮、光碟或其他各種數位化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站，藉由網路傳輸，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6 月 20 日

摘要

菲律賓呂宋島科地雷拉山區每年四月底都會有一個規模盛大的紀念性原住民抗爭運動——科地雷拉日（Cordillera Day）。該運動原先是為了紀念當地1980年反水壩運動領袖之一Macliing Dulag遭政府軍隊射殺的忌日，直至1984年科地雷拉人民聯盟（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簡稱CPA）成立之後，轉型成為每年聲援該區域反抗大型開發計畫的科地雷拉日。今日它不僅已邁向第31個年頭，每年的參與者皆有數千人，是菲國最大的政治性集會之一。除當地居民外，更包括其他國內與國際的原住民、人權等團體也都會前來共襄盛舉。

位於該山區東南側的Ifugao省過去少有採礦、水壩等大型開發計畫的議題，卻在菲國政府1998年簽署京都議定書、2008年通過再生能源法案之後陸續有水力、地熱發電等申請案出現。面對這樣的新挑戰，當地人以1986年之後政府陸續於村落層次成立的大量人民組織作為發聲與抗爭的重要動員基礎。同時因為有些地方網絡的抵抗難以撼動政府與跨國公司高壓力量，部份居民透過隸屬於CPA的伊富高農民陣線（Ifugao Peasant Movement，簡稱IPM）向區域、國家以及國際層次的原住民網絡靠攏。由於抗爭運動人群組成異質性高，不同層次的成員也不見得具有相同目的，理解抗爭運動背後的地方網絡連結與運作便顯得更為重要。本研究嘗試釐清這個在近幾年面對水力與地熱發電開發申請、自殖民時期以來一直處於邊陲的地方，決議發起與籌措抗爭運動的過程是如何凝聚眾人，甚至逐漸與世界站在一起。人們又是如何在抗爭之中各自織起自己的捕夢網，使得科地雷拉日不僅成為當地人在抗爭過程對內組織、向外發聲的管道，更形成當代菲國原住民爭取各種權益的重要精神指標。

關鍵字：菲律賓、科地雷拉日、原住民抗爭運動、再生能源開發計畫

一、背景緣起

2014年3月18日，臺灣有幾位學生與社運人士佔領立法院，企圖阻擋政府即將與中國簽訂的服貿協議。自此開始，社會大眾開始關注到一直以來默默在各項社會議題耕耘的非政府組織，也意識到現行單憑代議政治運作的政府體制不是全然沒有問題，未來將有賴於更多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力量督促與監督。這樣的現象其實在不少國家已不算是什麼新鮮事。菲律賓在1986年馬可仕獨裁政權垮台、柯拉蓉政府上台之後有大量的非政府組織成立，是擁有全球數量第三多非政府組織的發展中國家。藉由這些非政府組織的運作使得菲律賓的公民社會得以逐漸成形，人民可以透過不同的管道發出聲音，甚至能夠有機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科地雷拉日是由科地雷拉人民聯盟（The Cordillera People Alliance）這個人民組織所催生。該原住民抗爭運動導因於1970到1980年代菲律賓電力公司與世界銀行合作，欲透過軍隊強力的脅迫開發當地資源、興建數座位於齊柯河（Chico River）的大型水壩。以當時抗爭的領導長老之一Macliing Dulag被刺殺身亡的事件為重要轉捩點，由最初的追悼紀念活動轉型為現在每年於4月底左右舉辦的科地雷拉日，是菲律賓原住民重要且規模甚大的政治性集會。透過曾經參加過科地雷拉日的朋友引薦，我驚訝地發現臺灣的獵人學校、世新社發所等團體自1997年便不斷有人參與科地雷拉日或是進入當地組織實習，嘗試學習菲國原住民組織動員、向外界發聲的途徑與方式。於是我開始好奇這個頗具規模的抗爭運動是如何組織與連結，甚至將議題拉至國家、跨國的層次，吸納並影響更多來自不同地區的群眾一同參與。藉著文獻材料的蒐集，以及實際赴菲律賓參與2014及2015年科地雷拉日的經驗，我認為不單只是能夠藉此個案認識菲國原住民運動如何由地方、區域與國家層次串連、整合至國際的原住民網絡，更可以釐清該國原住民地方社會在歷經這麼多外在刺激後的實際運作模式為何。

實際上，科地雷拉日是科地雷拉山區居民在70到80年代藉由Mountain和Kalinga兩省傳統的跨部落協商機制——和平協議（bodong），成功動員、抵抗齊柯河水壩計畫而來的產物。1984年當原先哀悼Macliing Dulag的忌日要轉型成為科地雷拉日的時候，主張籌辦科地雷拉日的科地雷拉人民聯盟決定要淡化本來鮮明的和平協議傳統色彩，希望以原住民族抗爭運動的形式吸引到該山區社會文化相異的其他省份參與者。而每年都會在科地雷拉山區選擇一到數個地點舉辦的科地雷拉日就像是一種抗爭的手段跟形式，讓面臨政府或是跨國公司大型開發計畫壓迫、需要支援的村落得以有管道發聲。

然而，即便在菲律賓大學碧瑤分校科地雷拉研究中心的館藏裏頭，卻都完全沒有見到以「科地雷拉日」這個紀念儀式為切入主題的相關研究。如前段所述，每年在不同地點舉辦的「科地雷拉日」看似只是當地人抗爭的一種手段與形式，然而這個形式背後所隱含的卻是一種連帶著跨國原住民運動網絡的意識型態。我們不僅應當正視那個意識型態的內涵是什麼，更必須要注意的是地方如何且為何需要與這個網絡連結，才能夠真正理解科地雷拉日做為具有草根色彩的地方抗爭運動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與定位。

二、問題意識

本研究旨在透過科地雷拉日這樣的原住民抗爭運動，檢視國際、國家、區域與地方等各個尺度相互在摩擦、作用與影響過程之下的地方社會網絡。我認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區辨何謂全球或是地方的力量，重點反倒是這些纏繞交織在一塊的觀念與力量如何成為真實，然後發揮作用。因此，我將透過在Ifugao省的農民組織工作經驗，還有參與2015年的科地雷拉日籌措、協調與活動過程為切入角度，試圖描繪出該抗爭運動是如何與更大的網絡連結，以及其背後的地方社會運作模式為何。

為什麼選擇以地方社會網絡為出發點？科地雷拉日經歷了31個年頭以後，看似成為一個廣為人知且深具規模的跨國原住民抗爭運動；然而因為科地雷拉日多半是拉到地方舉辦，首先需要釐清的便是當地人如何認知與理解這些過去和他們生活經驗遙不可及的事物。對不少當地人來說，由於這個網絡以及其背後隱含的知識與意識型態仍然是新事物、新概念，所以事實上籌措與舉辦科地雷拉日的過程，他們是在運用轉譯並理解之後的概念，處理與協調地方原先的社會網絡面臨大型開發計畫的問題及衝突。而我要處理的問題正是當地人在不同尺度轉換的過程中，是如何鞏固、影響，甚至重構地方社會的運作模式。

這樣的取徑和過去該地區相關的研究明顯有所出入。從科地雷拉人民聯盟的訴求還有討論該地區抗爭運動的研究文獻中，我們可以見到研究者著重的多半是當地人 / 組織是如何運用原住民身份以及原住民性作為策略在爭取權益。(Bolinget 2013; Bertrand 2011; McKay 2006) 這個部分的確是分析該抗爭運動的時候不得不去正視的現象，但如果只是停留在這個層次，當地人的認知與論述有時候便顯得與運動的訴求有些斷裂且不同。是故，從Hout (2014) 和Hilhorst (2003) 討論科地雷拉山區的抗爭運動個案中，她們皆提到當地人實際上與運動推動者、組織工作者的發展論述有所差異。這個差異其實並非是全然斷裂的，而透過地方籌辦科地雷拉日過程中所遭遇的衝突、協商與行動來認清當地人的觀點與想法，也才能夠真正搞清楚這個從地方、區域、國家，一直到國際的網絡是如何可以連結與運作。

三、田野地概述

相較於科地雷拉山區的其他省份，以Ifugao省作為田野個案的獨特性在於，它不像是其他地區在六、七零年代即面對大量的採礦與水壩大型開發計畫。當地人過去面臨最大的困境多半涉及生計活動與地方政府的治理失能問題，而再生能源開發的議題要一直到氣候暖化、能源危機以及菲國政府簽署京都議定書之後才逐漸進到該地區。我的田野地在Ifugao省西部的Hungduan和Tinoc兩個郡。Tinoc在1982年以前只是Hungduan的一個村，兩地不論在該省、甚至是科地雷拉山區一直都屬於邊陲的地方，近年來卻同樣面臨水力與地熱發電的開發計畫申請。因此，我們可以見到當地人2009年在Hungduan、2015年在Tinoc分別主辦了科地雷拉日，嘗試吸引外界的目光與資源以解決當地的困境。



圖1 位於菲律賓呂宋島北部Ifugao省的田野地，包含Hungduan和Tinoc兩個郡

事實上雖然再生能源開發的議題對當地人而言是新興的挑戰，這並不表示他們過去從未有過其他類型的抗爭運動。方才提到Hungduan和Tinoc一直以來都是個邊陲地帶，不管是殖民政府或是獨立後的菲律賓政府都很少在這個區域有積極的建樹，於是與馬可仕政權實施戒嚴法差不多的時期，菲律賓共產黨的勢力在七零年代進到Ifugao省。這些進駐的共產黨員多半在山區與農民交好，白天一同工作，晚上則聚集在廢棄的家屋、學校等隱蔽的地方教育（schooling）當地人關於組織動員、國家與地方處境的相關議題。當地人因此開始懂得如何向政府要求自己應當擁有的權益，這點讓多年來以貪污與效能不彰聞名的地方政府反過頭來指責當地人受到共產黨的煽動而不聽命於政府，造成不少隸屬於共產黨軍隊的新人民軍（New People's Army，簡稱NPA）聯合當地居民和政府有些武裝衝突。直至現在，因為這樣的歷史背景，不少報導人在聽到Hungduan或是Tinoc之後都會直接告訴我那是共產黨的巢穴，要我盡量不要拜訪那些地方。

此般歷史經驗與共產黨的組織教育基礎延續下來，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1986年菲國的人民力量革命之後，地方社會如何將過去從共產黨學習到的那些和新政府的改革舉措結合起來。1986年上台的柯拉蓉政府，為解決馬可仕掌權期間經濟嚴重衰退的處境，不僅鼓勵境內的非營利組織（NGO）大量成立，更立法授權它們得以介入地方治理事務。與此同時，政府在村落層級輔佐農民、婦女或是耆老等類型的人民組織成立。這些人民組織多半是計畫型組織，也就是政府或是NGO嘗試引入地方的計畫將交由人民組織去處理，試圖讓資源、資金較少機會可以直接進到地方官員的口袋。乍看之下這是嘗試解決政府貪污與效率不彰的方式，實際上卻是把地方治理的爛攤子丟給人民自行吸收。舉例來說，某村落的農民組織在今年接了政府修築村落聯外道路的計畫，但政府只給了二十萬披索，其他多出來的費用則要該組織自行想辦法。於是當地人就必須透過動員或是向外爭取資源，才能夠解決那些政府不願

意負擔的人力、物力與財力。這樣的地方社會運作模式，無形中強化了當地人深具草根性的動員組織型態，也讓他們有不少與外界爭取資源與援助的機會。而不少過去與共產黨交好、隨後進入到各村落人民組織的組織工作者，很快地便掌握這樣的機會投入了「地方自治」的工作。

乍看之下，Ifugao省的人們對於抵抗跨國公司申請水力與地熱發電的計畫應當是相當團結且強勢的，實際上嘗試將科地雷拉日引入地方舉辦的伊富高農民陣線卻在推動過程中感到困難重重。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受到政府軍隊與警方大動作的盤問、恐嚇與脅迫，一些原先活躍的地方組織工作者因為害怕選擇噤聲。而起身反抗的地方官員、組織工作者以及居民則遭到不具名人士的惡意抹黑、造謠，指稱他們是與共產黨叛軍一起工作的夥伴。這點其實影響了試圖反對政府大型開發計畫的人們。他們因此更加謹慎的依循著「合法」的管道表達自己的訴求，包含該國原住民權利法案（IPRA）的上訴機制、依附在「合法的」人民組織以及宗教團體的底下動員行動，以防範政府的不實抹黑與指控模糊焦點。



圖2 在臉書社團The Ifugao Wall指控組織工作者為共產黨叛軍的圖片

再者，並不是所有在村落裡的人民組織都一定是支持反抗大型開發計畫。村落層次的不少人民組織成立之初，是政府嘗試藉著非政府組織導入資源與資金，透過它們來推行建設與計畫。除了那些平常就相當活躍、積極引入各種資源運作的組織外，有些組織平常看起來是完全停擺的，只有那些擁有資源、資金的計畫進來以後才開始活絡；也有些組織就是專門接政府或是特定非政府組織的案子，後兩者的組織運作模式顯然是較為功能性的，有報導人甚至認為那些是不值得一提的「假人民組織」。在參與今年度科地雷拉日的籌辦過程時，我們便遇到一些這類組織成員的質疑。對他們來說，這些政府主導引入、由地方組織統籌執行的計畫幾乎是該區域唯一可以發展與建設的途徑，反抗的結果可能將招致往後不會再有其他的發展計畫進來，更不用說他們可能因此再也沒有機會擔任警察、軍人或政府的公職人員。簡

言之，佐以支持反抗大型開發計畫的當地居民說詞，人們在乎的有很大一部分皆是生活能夠過得下去的方式，和他們的生存權益與安全息息相關。

除了生存權益以及安全的考量因素外，在伊富高農民陣線從事組織工作的報導人Ban還指出，Ifugao的人們過去參與其他省份相關抗爭運動的比例是相對少的，不少人因為Ifugao相對於該山區其他省較早接受殖民政府宗教、教育等方面的教化，認為自己和其他省的人相比是屬於較文明的「原住民」。比如說他們會偏好外人稱呼他們是Ifugao，而不是當初西班牙人概括稱呼科地雷拉山區居民為住在山裡的人Igorot。參與比例較少的原因還有他們是以「氏族」為日常社會網絡的基礎，不像是科地雷拉日起源地Kalinga和Mountain省有較為強烈的「村落」集體意識。一方面人們容易因為氏族的利益或是態度受到影響，不少從事組織工作的Ifugao人也時常因為受不了氏族或是家族成員的壓力而放棄與政府對抗，或者乾脆離開Ifugao省以避開這些人情的負擔。

綜合前述的情況，科地雷拉日的籌辦過程多半是在協調、解決這些問題與矛盾。雖然這些也不是只有在科地雷拉日籌辦的過程才忽然出現的情況，而是在他們日常生活中就已經需要面臨的處境，只是種種的矛盾與衝突在科地雷拉日這般的特殊事件中更是凸顯。相較於舉辦科地雷拉日早已行之有年的科地雷拉山區其他省份，Ifugao省的當地人如何理解、考量與籌辦科地雷拉日，這些都必須回歸到他們的地方網絡是怎麼樣運作與組織動員，才能夠進一步去看他們怎麼和不同尺度的網絡相互協調與連結。

四、文獻回顧

本研究以科地雷拉日為切入點，雖然並未有以「科地雷拉日」為主題的研究，卻有一些文獻從促成科地雷拉日的指標事件——反抗齊柯河水壩計畫的角度來探究其意義。（Sterling 1977; Brady 1979; Drucker 1985）首先，該水壩計畫的爭議不該只是以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對立與矛盾來解釋之，其背後更隱含發展概念的認知差異以及國家框架之下族群權力不平等的關係基礎。再者，地方是在向政府與當時的總統陳情未果的情況之下，一方面以和平協議（bodong）的傳統社會協商機制組織動員，另一方面和當時勢力正好進入科地雷拉山區的共產黨合流。有別於馬列主義將革命的希望寄託在無產階級的身上，菲律賓共產黨奉行的是毛澤東以農民革命為主體的路線。強調在能動的政治行動中，屬於上層結構的主觀意志能夠超越客觀經濟的約束而成為社會變革的動力（Meisner 2012 [2007]: 6-7）。在歷史的偶然性之下，科地雷拉山區後來在各個地方的抗爭便強調以各族群的文化與社會網絡進行動員，試圖將文化轉化成改變社會、打造公共領域的基礎。

Jame Scott (1976) 以東南亞地區農民的道德經濟為題，指出這些農民在面臨生活中的各種抉擇時，多半是採保守的態度。也就是說，他們不若經濟學假定人是追求最大利潤，反倒是會選擇低風險、能夠生活下去的方式。基於這樣的論述基礎，我不禁好奇當地人持續多年來參與抗爭運動的動機為何。在科地雷拉日這樣的抗爭運動與組織動員型態萌芽之時，正值菲律賓馬可仕政權實施戒嚴法、並嘗試以高壓力量開發大規模自然資源的時期。面對如此

的政府勢力，當地人為何仍選擇進行抗爭？又是透過什麼樣的抗爭形式與策略，讓他們能夠使得自己的傷害降到最低？Bertrand（2011）分析科地雷拉山區原住民在運動上的兩種策略。首先就國家的層次來說，他們團結同樣在國內的原住民群體，以「民族」（nations）的身份主張爭取自治權利。同時，他們在國際間強調自身原住民的身份，還有自己是興建水壩、開發主義等相關議題的受害者，嘗試向國際原住民族的跨國網絡靠攏。McKay（2011）也有相似的觀察，他見到非政府組織近年來嘗試教導科地雷拉山區的住民以「原住民」身份，依循著該國原住民權利法案（IPRA）所訂定的管道爭取過去難以獲得的土地所有權與資源。

然而，為什麼當地人在爭取權利以及抗爭運動的策略中皆欲透過強調原住民身份來達成目標呢？Niezen（2003）討論的「原住民性」概念（或稱原住民意識），正好說明了該國原住民是透過什麼樣的連結方式向跨國原住民網絡靠攏。在他解釋原住民性的概念時，借助Maybury-Lewis的分類區別出族群團體和原住民的不同。原住民是一種特定的社會範疇，相對於族群團體帶有先驗的污名假設，藉由相似的受難經驗得以形成當代跨國原住民族運動的發展動力。然而，依此脈絡發展而來的原住民主義（indigenism）容易將原住民的文化視為靜態、無時間感的存在，各自的社會與歷史脈絡也著實難以用一套模型界定。因此，Niezen主張我們習以為常的原住民意識與原住民性其實是一種透過不斷修補而來的認同（bricolage of identities），是在技術、權力與國家法制系統等因素影響之下的產物。菲律賓原住民這個分類其實也是如此，這和該國原住民與低地人遭逢的殖民歷史背景以及族群關係有關。

從Dozier（1966）爬梳科地雷拉山區的殖民歷史紀錄可以看到，西班牙人在統治菲律賓之初命令原先散居四處的人群必須集中住所，以利管理。然而，因為科地雷拉山區山腳下的瘧疾情況嚴重，造成殖民者無法順利進入山區，使得殖民政府對該山區的管控一直處於模糊不明的情況。有鑑於此，西人在治理的態度上是相對放任的，對他們的稱呼想當然爾也是十分地籠統並且不精確。相較於低地人，高地的原住民被稱做是Igorot，意指住在山上的人。這個詞彙最初並非指涉任何與族群相關的概念，gorot指的是山脈，而開頭的I表示你從哪裡來（McKay 2006：293-294）。甚至到後來低地人多半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不願改宗的山區住民被西人稱做是Pagans——沒有基督教靈魂的原住民（Goda 2001：3）。簡單來說，西班牙人並不重視實際上的族群分類，所以不論是Igorot這樣的地域性範疇或是具有宗教意涵的Pagans便被他們直接拿來指涉科地雷拉山區的原住民。

美國殖民時期基本上是沿襲著前期的人群分類系統，將菲律賓人分做Pagans和基督教化的土著（Christianized natives）。然而，為了能夠更徹底的控制科地雷拉山區的住民，他們決定派遣傳教士深入山區進行傳教與風俗民情的調查（Dozier 1966：37）。乍看之下，他們似乎與西人一樣都是想要以傳教為管控的手段，但其實際操作過程的差異卻使得美國又得以更細緻地修正人群分類系統。事實上教會為了有效率的使當地人改宗，要求傳教士先習得當地人方言，並用方言翻譯聖經以利閱讀（Goda 2001）。此外，針對受洗的新教徒，傳教士也教授他們英文，使他們便於和外界接觸，企圖藉此強化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差異（McKay 2006：296）。傳教士這樣的做法一方面讓當地人對改宗的意願增高，同時讓殖民政府對人

群分類朝向區辨出不同的方言群。殖民政府將傳教士辛勞耕耘地方的經驗作為管控當地人的基礎，將方言群視為科地雷拉山區居民的一種具意義的結群原則與分類方式。從1903年政府對菲律賓的人口普查中便可以見到，他們調查的項目包含部落、種族、宗教以及語言，其中出現在人口普查表單上的族群名稱，諸如Bontoc、Kalinga以及Ifugao等皆是以各方言群語言命名之（Goda 2001：3-6）。這些分類與先前提及的Igorot並不衝突，由於Igorot是用以指涉整個科地雷拉山區的人群，憑藉方言群而來的名稱也只是更細緻的分類而已。是故，也會有人以Bontoc Igorot、Kalinga Igorot等名稱稱之。殖民者做的人群分類工作，甚至在菲律賓獨立建國後也同樣作為人口普查標準，原住民這個分類的範疇便被誤認是天生且理所當然的。

由此可知，菲律賓原住民和低地人的差異不見得真的有本質上那麼大的不同，差異反倒是在歷史過程中逐漸形塑而成。這個被刻意區辨出來的結果，也就是科地雷拉山區的原住民被視為較低地人傳統、不文明且具有本質上的差別——這正符合過去有些學者在討論東南亞的社會文化特性時，會將高地、低地的生態及社會差異視作是一個區域內部顯著的特徵（King and Wider 2006: 14-18）。而James Scott（2009）嘗試突破這種相互對立的研究傳統，主張高地與低地是共生的歷史有機體。Ifugao省在西班牙殖民者進駐之前便已經與低地有著密切往來的商貿關係，更不用說該區域的地理位置以及殖民歷史經驗一直是介於高地與低地之間，不能夠單純以原住民性來囊括該區域的人群認知以及抗爭運動樣貌，勢必要從更地方的社會文化網絡層次去理解之。

五、研究方法

在確定要以科地雷拉日做為田野調查目標以後，我便開始著手於本研究主題的相關文獻搜集。首先透過在臺灣圖書館中所能取得的研究文獻以及網路資料開始，分別於碩士班「東南亞當代議題」以及「世界原住民專題」課程書寫「從社會運動看殖民知識與原住民主體性：以菲律賓科地雷拉日為例」還有「和世界站在一起：菲律賓原住民抗爭運動與跨國連結」的期末報告。同時我也直接在菲律賓大學碧瑤分校的科地雷拉研究中心、伊富高農民陣線圖書室搜集相關文獻，試圖補足在臺灣不易取得的地方材料。

這些文獻分析的工作讓我在實際進入田野以後有非常大的幫助。我分別在2014年4月、2015年2月至5月進行兩階段的田野工作，包含田野可行性、研究主題評估以及實際上參與伊富高農民陣線籌辦科地雷拉日的組織工作。2014年第一階段的田野工作是跟著宜蘭縣崗給原住民永續發展協會的成員一同赴菲律賓參與科地雷拉日。由於那是第一次到科地雷拉山區並參與科地雷拉日為期三日的儀式，是故在過程中嘗試紀錄整個活動流程，並透過對當地人的訪談以及同行已經參加過八年科地雷拉日的臺灣友人分享，釐清諸多不解之處。第二階段的田野工作，有賴於前次調查的基礎與建立的關係人脈接觸到更多實際參與地方組織工作者。為了完整觀察科地雷拉日的協調、籌辦過程，我與伊富高農民陣線的成員一同工作，和他們到訪各個村落說服當地人參加，更在舉辦科地雷拉日的村落協助當地人的日常工作，同時藉此進行較為深入的訪談工作。

目前雖然回到臺灣進行資料整理的工作，但一方面透過臉書向菲律賓報導人追蹤最新的動態與狀況，我也參與菲律賓移民工在臺灣的同鄉會、世新社發所邀請科地雷拉人民聯盟成員為該校原民中心學生受訓的課程等。這些經驗不僅讓我在資料整理的過程中仍然不至於完全斷掉與當地的聯繫，也能夠因此釐清在地方田野調查過程中，較少著墨的跨國網絡連結觀察。

六、田野成果評估

從科地雷拉日作為切入點的初衷在於：見到臺灣不少原住民團體嘗試遠赴科地雷拉山區學習當地人如何從事組織工作。然而受限於語言的關係，大多數人無法真正釐清在菲律賓的自身脈絡之下是如何建構出如此草根且規模甚大的抗爭運動。此外，以地方網絡為出發點的原住民抗爭運動分析，則有助於突破該地區過去相關研究的限制，也就是多半僅以抗爭策略以及發展論述為主的分析，少有真正爬梳出菲國原住民地方社會運作模式脈絡的作品。當我們藉由科地雷拉日籌辦過程中釐清該地區當地人的想法與動員組織形式，才能夠理解當地人在地方、區域、國家與國際不同尺度之間轉換的過程中，是如何鞏固、影響，甚至重構地方社會的運作模式。

除此之外，對照臺灣既有的原住民運動之可能貢獻。由於臺灣原住民身份的認定較菲律賓更沒有彈性，是以血緣關係作為判定原則，這樣的差異易於讓我們看清「族群」分類範疇以外的影響因素與層面，而不是將運動中許多力量簡單化約為謝世忠（1987）提出的「原住民真理性」概念。再者，就實踐的層次來說，臺灣原住民運動發展至今已由起初的泛族群組織行動轉向各部落的組織扎根。相較之下，科地雷拉日、科地雷拉人民聯盟及其友好的相關組織嘗試打破這樣的藩籬，一方面有向外共同抗爭、爭取資源的力道，另一方面也不斷在地方蹲點以擴大其影響力。在我看來，本研究著實能夠成為臺灣原住民運動的異文化參照點，提供不一樣的角度省思。

七、計畫構想

（一）論文架構初擬

章節	主題
第一章	緣起：如何織成一個捕夢網
第二章	科地雷拉日的歷史因素與形成過程
第三章	Ifugao省科地雷拉日的籌辦過程
第四章	「地方」網絡的連結與運作
第五章	結語

目前的論文框架构想是先爬梳科地雷拉日的形成背景。包含了殖民時期政府如何將該山區居民劃定為與低地人不同的分類系統，該分類系統不僅影響到後續的族群認同，同時也造就了政策的差異、社會文化網絡機制的存續與消逝。這些歷史經歷不會只是背景知識而已，更是直接形塑後來科地雷拉日樣貌的重要關鍵。在釐清科地雷拉日的形成脈絡、特性與背後所隱含的知識體系之後，便將重心轉移到面臨再生能源開發這種新興挑戰的Ifugao省。關於Ifugao省，首先將從田野地邊緣的歷史開始說起，Hungduan和Tinoc不僅在殖民歷史中沒沒無聞，在Ifugao省的族群關係中也是屬於邊緣的位置。藉由書寫Ifugao省籌措與舉辦今年科地雷拉日的過程，看當地人如何從邊緣的視角思考大型開發計畫，以及引入各種外來知識、資源的科地雷拉日。這些最終都將反映出地方網絡究竟是如何連結與運作。實際上，所謂的地方也沒有這麼的「地方」，而是不斷在國際、國家、區域與地方尺度的轉換之中逐漸形成的真實。看當地人、組織工作者，外國參與者是如何在這些過程中構築各自想像的未來，織成一個個捕夢網。

(二) 後續計畫期程

時間	計畫進度	地點	接洽單位
Feb. 25, 2015~ Mar. 22, 2015	藉由當地文獻與研究資源釐清該區域的歷史文化、研究取向。並從區域性的科地雷拉人民聯盟認識科地雷拉日的定位、當地NGO-PO網絡的運作模式	Baguio City, Mountain Province, Apayao Province	Cordillera Studies Center, UP Baguio Cordillera People Alliance
Mar. 23, 2015~ May 22, 2015	實際參與地方組織工作，並協助籌辦當地本年度的科地雷拉日	Ifugao province	Ifugao Peasant Movement
May 23, 2015~ June 30, 2015	返臺整理田野材料，書寫補助計畫之成果報告	Taipei	
July 01, 2015~ Feb. 28, 2016	文獻閱讀與整理、完成論文初稿	Taipei	
Mar. 01, 2016~ May 10, 2016	實際參與地方組織工作、觀察地方對於菲國大選的態度與作為	Ifugao province	Ifugao Peasant Movement
May 11, 2016~ June 30, 2016	返臺整理田野材料、修訂論文內容	Taipei	

八、參考文獻

謝世忠

1987 〈原住民運動生成與發展理論建立：以北美與台灣為例的初步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64：139-177。

Meisner, Maurice

2012[2007] 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溫洽溢譯。新北市：衛城出版。

Bertrand, Jacques

2011 'Indigenous peoples' rights' as a strategy of ethnic accommodation: contrasting experiences of Cordillerans and Papuan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Bolinget, Windel

2013 Stat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indigenous peoples workshop on aid and development effectiveness.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windel-bolinget/statement-of-the-international-indigenous-peoples-workshop-on-aid-and-development/375664779209670?pnref=lhc#_=_, accessed July 10, 2015.

Brady, Carol

1979 To know the meaning of the Chico Project. Philippine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6(9):114-130.

Dozier, Edward

1966 Mountain Arbiters: The Changing Life of a Philippine Hill People.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Drucker, Charles

1985 Dam and Chico: Hydropower development and tribal resistance. The Ecologist 15(4): 149-157.

Goda, Toh

2001 Cordillera : diversity in culture change : social anthropology of hill people in northern Luzon,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Hilhorst, Dorothea

2003 The real world of NGOs: Discourses, diversity, and development. London; New York: Zedbook.

Hout, Floor van der

2014 Indigeneity in the Cordillera (Philippines): On the friction between localities and universalities. Bachelor thesis Cultural Anthropology, Utrecht University.

King, Victor and William Wilder

2006 The modern anthropology of South-east Asi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McKay, Deirdre

2006 Rethinking Indigenous Place: Igorot Identity and Locality in the Phillipin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7(3): 291-306.

Niezen, Ronald

2003 A new global phenomenon. In The Origins of Indigenism: Human Right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1-28.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terling, Claire

1977 All about big dams and peoples' movements. Rural Monitor 1(5): 1-11.

九、附錄圖片



圖一、青年組織在菲律賓大學碧瑤分校紀念該國學生運動五十週年的演出



圖二、紀錄老農婦插秧的工作情況



圖三、Sagada傳統稻米儀式之長者祈福過程



圖四、政府部門受理農民土地爭議的調解



圖五、伊富高農民陣線成員William Bugatti遭射殺身亡的週年追思會



圖六、已改宗天主教的巫師講述過去習巫的過程



圖七、Tinoc郡舉辦的聯合運動會及文化競賽



圖八、伊富高農民陣線舉辦戒嚴受難者與耆老論壇



圖九、地方農民組織開會說明咖啡樹種植計劃



圖十、Tinoc郡過去的梯田景象已逐漸被蔬菜種植所取代



圖十一、當地農人於閒暇時共同討論的景象



圖十二、與其他國際參與者拜訪耆老說明來意



圖十三、村民共同為科地雷拉日準備的過程



圖十四、預計開發地熱發電計畫的地點



圖十五、科地雷拉日當天的報到處



圖十六、科地雷拉日的部分參與者



圖十七、電力公司工程師自發參與科地雷拉日說明水壩興建原理



圖十八、當地組織工作者收到的死亡恐嚇信，以伊富高傳統壽衣為象徵



圖十九、1998年科地雷拉日宣傳圖



圖二十、村民於村辦公室開會景象